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总是想起外婆钟雪影，想起她神情泰然地向我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红色往事。她喜欢对我讲这些事，一方面可能因为我懂事较早、略通历史，另一方面，这些红色往事早已成为我们家族史的一部分，是家风中最引以为荣的。

外婆出生在西药房商人之家，太外公在上海有些产业，家境可谓殷实。外婆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大弟钟沛璋，妹妹钟雯娟、小弟钟信耀（后因革命需要改名为陈古海）。按照太外公的设想，把孩子们送去读大学，培养成人，以后可以继承家业。但他没有想到，孩子们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思想，外婆的三个弟妹在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英勇的地下党员。

外婆并不是党员，三个弟妹保守党的秘密，没有向她说出真相。但外婆是个敏锐的人，当她看到三个弟妹经常聚在大沽路

听外婆讲那些红色往事

邨亮

411弄4号的家里开会，也经常有一些儒雅热情的青年人（新中国成立后她知道里面有吴学谦、李琦海等人）进出老宅，她就知道这些青年人都在做进步的事业。外婆虽是家里的大小姐，但她理解革命，也暗暗支持着革命。

“你大舅公钟沛璋还以为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哩，但我并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所察觉。”这事是很多年之后外婆告诉我的。有一次大舅公将一份秘密文件放在衣服口袋里，结果外婆在为他洗衣服时不慎将文件浸湿，外婆预感这文件可能比较重要，所以就把它晾干，不声不响地又放回衣袋里。其实大舅公当时也已知道外婆的用意，在外婆去世后，大舅公曾撰文讲到此事，感慨外婆的善

解人意和对革命的默默支持。只是在非常年代，姐弟俩心照不宣而已。有一件事是外婆颇为得意的，这也是后人评价外婆机敏、锐智、勇敢的最佳佐证。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地下党的搜捕和迫害持续升级。也在这个当口，大舅公在上海主编的宣传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的进步刊物《青年知识》被察觉，特务直接到大沽路老宅搜查。当时所幸两位舅公都不在家，但特务的到来预示着老宅已经被盯上了，他们完全可能来一出蹲守的戏码。

外婆当时觉得最紧要的就是尽快通知两个舅公不要回家，迅速撤离上海。可是当时没有手机，在茫茫的上海，如何以最快的速度送出警报呢？外婆知道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小舅公陈古海当天有课，她就甩掉特务，直奔圣约翰寻人。到了学校又有一个问题，偌大的校园，又怎么知道小舅公在哪间教室？外婆急中生智，通过在各个车棚里寻找小舅公的自行车以确定小舅公的方位，第一时间通知了小舅公，让他快走。最终大舅公和小舅公都撤离上海，而未能及时撤离被逮捕的一些地下党员后来在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被杀害。

很多年后两位舅公还在感叹，外婆对整个家庭、对革命事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如果不是她的锐智和勇敢，他们可能早已被捕牺牲，也就没有办法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

当然，在诸多红色往事之中，外婆最引以为荣的就是亲手缝制了迎接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这



夜光杯

件事情在她心中的分量极重。1999年上海解放50周年，在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外婆还重点谈及此事。1949年5月上海临近解放，当时大舅公钟沛璋受党组织的指派，负责筹划上海迎接解放的宣传工作。一天他告诉外婆，他们需要一面巨幅红旗。外婆立刻告知在绸庄当会计的外公唐泰来，外公之前已有准备，很快就带回家整匹的红绸。是夜，外婆和太外婆还有几位其他女性家人连夜缝制出红旗。1949年5月25日，上海四周枪炮声此起彼伏，当东方一轮红日升起，人们抬头看到上海跑马厅（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钟楼上，上海人民宣传队员已经挂上了鲜红的解放大旗。这正是外婆她们亲手缝制的旗帜。这旗帜成为上海人民迎接解放喜悦之情的一个象征。

外婆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4年了。这位机智勇敢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位“红色老太太”，却总是与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站在一起。每逢党的生日或者国庆节，我都会想到她，想起她对我说的那些红色往事。是的，老一辈革命者正在凋零，但他们也在中国延绵不绝的红色事业中获得了永生。

母亲节那天，陡然想起一句熟悉的歌词：Mama, do you rem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妈妈，你可曾记得给我的那顶旧草帽)，忍不住哼唱起来，又将乔山中的原曲转发到朋友圈，有年长的朋友立马留言说不闻此曲久矣，还津津有味地向我讲述起《人证》的故事情节来。

这让我有些脸红，电影《人证》在国内热映之际，我还是无知蒙童，诚所谓“余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就连主题歌都是听刘欢翻唱的版本。经不住朋友“撺掇”，找来电影一看，居然是一部推理片，搁在当下也是很潮的主题，撇开技术上的局限性（或者说胶片时代的特色），诸如冗长的镜头，灯光和音效上的缺陷之类，这部影片的内容着实引人入胜。

故事主线很简单：1950年代初，少女恭子和一位驻日美军士兵生下了孩子，多年后，恭子成为知名服装设计师，在她的作品发布会上，这个叫焦尼的孩子回来找她，为隐瞒旧事，恭子不惜杀死焦尼，影片的最后，恭子也追随孩子而去。

在影片中，草帽既是破案的重要物证，也是母子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片头部分节奏欢快的《草帽歌》旋律，以及片尾处焦尼饰演者乔山中凄绝的歌声，恰好呼应了故事转折，无怪乎当年的观众对这首歌印象极深。

好的文艺作品，既是时间与空间的沉淀，亦要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与为推理而推理的悬疑片不同，《人证》背后埋藏了一段日本二战后难以言说的历史问题，或许在今天看惯推理小说与影视剧的观众眼里，《人证》的剧情发展并不复杂，但故事线索与历史背景巧

妙结合，使得起伏跌宕的剧情有了合理的落脚点。细细想来，《人证》这样的商业片，进入中国之后被解读成文艺片（同样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电影《追捕》），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文艺学上称之为“误读”，盖观众凭借已有的知识背景，将影片作了溢出其本来面目的解读，增添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部四十多年前拍摄的影片，于我这样迟来的观众而言，也是容易产生“误读”的渊藪，初次听到《草帽歌》时，我无端以为影片背景是宫崎骏风格的田园风光，所以对歌词中提及的“草帽”“山谷的风”云云，全视为乡间生活之一途，及至看过片子，才知道这样的想象未免太过美好，片中的草帽多半是托奎拉草编织的巴拿马软帽，可不是普通乡民使用得上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草帽的盛期，当时国内化纤工业尚不发达，稻草编成的帽子是夏天防晒的恩物，比不得化纤帽轻盈透气，但胜在价格便宜、经久耐用，与白色的确良（涤纶）衬衣，一起走进了夏天的经典记忆。

稻草帽有什么好呢？我至今记得草帽接缝处扎人的毛刺，或是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一阵风吹来，将草帽吹走老远，还得一路奔走着去抓帽子，若是旁边的路人一起哄，那窘态就别提有多难堪了。

好在回忆有一个绝佳的功能，便是滤去痛苦的一面，只留下甜甜的清爽的一部分，又到初夏，重新听一听《草帽歌》，想着在风中追逐草帽的少年，原来无意的误读，也是美好的源泉。



诗词童年乐

王丽娜

童年，在记忆里永远是甜蜜的歌谣。歌词或许因为远去而有所模糊，但那音调却五彩斑斓，是小时候捉迷藏的嬉闹，是吃糖果的快乐，也是和妈妈手牵手的温馨。童年，似乎很难用词语来描绘它，如梦如幻，如歌行调。记得当时年纪小，你听了，我笑了，不知道花落多少，依稀在几多诗词里拾取这吉光片羽。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不知道为什么，童年的故事里总有根钓竿的存在。小小儿童，人还没有竹竿高，却煞有其事地学着大人的模样就准备钓鱼。小孩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水面的动静，连路人问话也不敢直接回答，只是用手势比画，生怕错过鱼儿上钩。如此小心翼翼，细节描写得似乎身临其境，让人对这钓鱼孩童喜爱值加倍。

在我女儿的小学一年级课本中有首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这几句诗是李白《古朗月行》中的节选。她可能不明白这首诗后面几句的意思，不过对前面四句诗特别有感情，她说小时不识月，是不是就像她一样把月亮当作大圆盘？女儿说这话的时候，仰着红扑扑的小脸，张着忽闪闪的大眼睛，就像月亮一样可爱。让我想起她小的时候，只要晚上看到月亮，就会念童谣，“月亮走我也走，我和月亮是朋友，兜里装了两块饼，送它明天当早饭。”月亮，穿越古今，跨越年龄，小时不识月，但它总在你的记忆深处。

童年，不仅是嬉笑玩闹，对于以前的小孩来说，童年也是参与家庭劳作的。范成大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几句诗，便把田园劳作的场景，儿童的点豆种瓜描绘得如在眼前。曾经，在我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有一种特殊的假期叫做“农忙假”。

日期大抵在春、秋两季，时间不固定。大抵是农村家庭忙着收成的时候，让小朋友们能回去帮家中长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务。现在的小朋友，可能连这个假期名字都未必能听说。捉黄蝶、采野花、放纸鸢，诗词的童年之乐带回来的却是不同感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欢乐，今日的童年乐，是今天的味道。当孩童仍是孩童，不知自己还只是孩童，他们和天同乐，和月而眠，他们站在每一座峰顶，向往更高的山峰。童年无畏，因为光和希望是最大的向往。和童年以诗，向往如故。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辛丑仲夏钱汉东撰并书

初夏，很宜人，特别是夜雨，我情有独钟。

我最喜欢漆黑的夜晚，雨入荷池，蛙举绿伞的那一幕，间杂着荷花的香味跟着雨雾细细地飘来，大自然的灵性与人间至美的诗意交融到了一起，令人赏心悦目。观雨是一种心情，听雨则是一种心境。愉悦的时候，雨，就是欢乐的鼓点，激昂奋进；悲戚的时候，雨，就是忧伤的泪滴，肆意流淌……

夏夜听雨声，需要去乡野听，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需要躺在床上把灯关了，让满世界的黑拥抱着自己听，需要把自己的心融入草木间听……风像个探子，把一切的叶子翻个遍，招呼雷声和闪电出场，雷声像碌碡在碾压着满场的麦子，咕噜咕噜由远而近，发出木与石的摩擦声；而闪电则变得妖娆妩媚。很快，风止，能听到沙沙的声响从远处传来，像是千军万马奔涌而至，瞬间又去了远方，那是雨滴落在树叶上、庄稼的叶子上而发出的声响。夏雨落在草屋上，悄无声息，就像一碗水泼在了海绵上，那是远去、渐渐消失的天籁；雨落在黛瓦上，发出脆生生的响声，有竹筷敲在瓷碗上的韵味，很多时候，还能听到雨点砸在破脸盆上、木桶上、瓦罐上、雨布上，甚至，窗户的玻璃上……雨滴是上苍赐予我们的信物，它们不会厚此薄彼，它们要润泽世间万物，包括我们饥渴的心。

初夏，夜听雨

张新文

宋人蒋捷听雨听了一辈子，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老年听雨僧庐下，他从雨声里听出了年少轻狂，听出了漂泊流离，听出了望乡愁绪，听出了暮鼓晨钟里的彻悟人生。夏夜听雨，雨滴是透明的算盘珠子，滴滴答答的声响，是无数双手在夏夜里累计着秋天的收获！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2021年的夏夜听雨，意味深长，风雨百年路，丰碑耀千秋！我们的党经过100年的磨砺，何惧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雨过天晴，明天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夏夜听雨声，更需要淡定和宁静，只要侧耳聆听，每个人都能听出别样的境界和感悟，不信？你试试……



地制成铜凸版再“拼装”套印上去。由于印钞物资均需秘密运输，金融业的地下交通员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出入于敌人关卡林立、岗哨密布的敌战区和根据地之间，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为新四军获取申城金融援助立下汗马功劳。

好儿女志在四方。为了适应根据地建立印钞厂的需求，地下党陆续输送约100名印钞技术人员和工人，为红色货币印制发行保

新四军来了“钞”级外援

黄沂海

驾护航。上海“印联”党团成员、理事吴以常秘密奔赴苏南，帮助创办了水上印刷厂和江南印钞厂。

曾在国统区中央印制厂谋职的“制版高手”过雪川，不仅在上海协助筹建中的大江银行制作完成钞票底版，还设法将印钞机具及配件购置齐全，又按照印刷钞票11道工序，在申城物色招募了数十名技术工人，突破重重严密检查封锁，“化整为零”运送至皖江根据地。开始试机时，由于采取柴油机发电带动胶印机的作业方式，回气管浓烟阵阵，机器马达轰鸣，动静甚大，很容易被日伪查获，不得不改电动为手摇发电。凭着“钞”级外援的

吃苦耐劳，不出一个月，印制完成了5元、1元、5角和1角等大江币100万元之多，进一步巩固了皖江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因为劳苦功高，过雪川还被任命为大江银行印钞厂厂长。

胶印的大江币在皖江根据地发行后，替代了原来的土纸大江币和代价券等早期根据地货币，受到老百姓信任与青睐。随着大江币的信誉逐步提高，很快占领了根据地货币市场，彻底赶走了日伪币和法币。当新四军陈毅军长来到大江银行印钞厂车间视察时，手持刚从印钞机里“吐”出来的红色“壹圆”票券仔细端详，听到陪同人员介绍来自上海的幕后英雄，赞不绝口：“我说的嘛，怎么这么好，没错！上海的工人阶级，干得漂亮！”

旋乾转坤，旧貌新颜，原先奔赴革命前线的“印联”骨干，伴随人民解放军的猎猎战旗迎风而行，重返上海滩，参与旧政权留下的印钞机构的接管、生产工作，“启动了机器轰鸣地响”，夜以继日赶印第一套人民币，为尽快恢复城市经济秩序添砖加瓦。

十日谈

银柜背后的较量

责编：龚建星

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各大金融行业的群众性组织纷纷创办报纸刊物，拓展舆论阵地。